

张洁海外游记

张 洁 著

华文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洁海外游记/张洁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5. 12

(中国作家海外游记丛书)

ISBN 7—5075—0475—1

I. 张… II. 张… III. 游记—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402 号

张洁海外游记

张 洁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9.80 元

目 录

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1)

访美散记

库特·冯尼格说：NO! (157)

我不后悔到纽约去..... (167)

在杨伯翰大学讨论《红字》..... (174)

金斯伯格，你将怎样呢？..... (181)

“嘭？”“NO 嘭！”..... (187)

保尔哭了..... (203)

如归..... (210)

房客们..... (214)

书到用时方恨少..... (220)

想起五月的那个下午，掷进特莱维

 喷泉的一枚银币..... (224)

重归威斯林..... (227)

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 (234)

惊魂“小印度”..... (239)

还有勇气吗？..... (244)

你为什么老是呲着牙？..... (248)

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一、他们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一道滋味儿难辨的杂和菜的柏林——确切地说，是西柏林到了。

我走出机舱，迎面碰到的是史宾格朗架在肩上的摄影机，一挺重机枪似地瞄着我。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助手，举着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人的放大照片，以“验明正身”。

我很不自在，差点用手把面孔挡起来。因为那场景很象克格勃被驱逐出境；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被破获；或策动某起政变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审的非常情况。

除了我们本人，他还拍了出现在行李传送带上的中国作家的人造革提箱。比照作家的身份，人造革提箱可能不那么讲究，不过它是中国作家协会免费借用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人，只有在成为至圣先哲之后，

他用过的一个勺、或坐过的一张椅子，才会花那么多胶片拍下来供后人膜拜和追念。如此这般，只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中国作家能够前来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重视。

除“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外，3月份在北京一同开过会的诺瓦克、彼德·施奈德，以及我的《沉重的翅膀》一书的译者——阿克曼也来机场迎接。

王蒙、我，和他们3人，同乘施奈德的汽车，前往下榻的旅馆。汽车由阿克曼驾驶，施奈德因酒后开车，刚刚被警察吊销了执照。

阿克曼开车，如理发师推头，用了一把不好使的推子。理出来的头发，如俗语所说——和狗啃的一样。他的刹车，频繁而突然。每次刹车，众人都要猛地往前一栽。他解释说，他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很久没有开车了。阿克曼前我们一天，乘别的航班到达西柏林。他不敢与我们同乘CAAC航班，据说这次发给他的翻译奖，奖金只有5000马克。而CAAC的往返机票，不但比其它航空公司贵出许多，还很难买到。

CAAC的机票可能比某些航空公司贵，但机上的供应却慷慨大方。空姐送过一次之后，几辆饮料车，就分别停放在A、B、C舱之间，由乘客随意自取。不象别的航空公司，始终由空姐殷勤备至地送到手上。那样一来，你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障碍，总不好意思让她一趟又一趟地为你服务吧。尽管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一切费用，都已包括在机票之中。CAAC的耳机，也是免费使用，泛美公司的耳

机，则需租用。

红灯。我们大家又往前栽了一下。在等绿灯的时间内，我浏览街景。西柏林夜生活的时间，可能比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都长，大约持续到午夜后的一两点钟。此时只有11点多，街上自然灯火通明，人们的游兴正浓。相距不到一米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男青年，探头躬身地往我们的汽车里张望左右。我以为他认识我们之中的谁，找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谁知他这样张望之后，便转过身去，在一棵树下，以一泻千里之势撒了一泡尿。我记得在美国随地大小便是要罚款的。西柏林不么？我不明白，既然他如此地痛快淋漓，又何必往我们的汽车里瞧呢？噢，也许他在瞧车里有没有警察。我差点将我的惊讶表示出来，但车上的人，个个安之若素，我立刻噤声不语，否则便显出我的教养之差。

很快就到了旅馆。大厅及酒吧都很富丽，住房却比不上北京的建国饭店，价钱可不含糊。阿克曼说，他只能在这个旅馆住两个晚上，房租太贵，明天就搬到朋友家去。阿克曼用钱一点也不小气，可以说比我见到的好些洋人都大方，都慷慨。

安顿好行李之后，和诺瓦克、施奈德、阿克曼、史宾格朗在旅馆的酒吧里聊天。

“我们离开北京之后，你们在背地议论过我们吧？”施奈德问。他有一张令人感到可亲的、象农民一样结实的脸。

“没有，不过我说过这种会议，只能使我们之间的了解停留在一个非常表浅的层次上，倒不如有机会多作个人的

接触，也许还能就我们个人的创作，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我反问：“你们背地里议论过我们？”

只见诺瓦克和施奈德激烈地交谈了几句。阿克曼说：“倒是他们之间，背地里互相议论很多。”

我理解。天底下文人的习性，大致都差不多。

施奈德对我说：“不过我和你吵过一架。”

“是吗？我没有这样的印象。”也许我和人吵架吵得太多，吵得太大。也许他把一般的辩论当作了吵架，总之我一点也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好，我希望永远不要和你吵架。”

怎么会呢，那样朴实而诚挚的施奈德。

将近 20 个小时的旅行，使我精疲力竭，可是我们还是谈到午夜一点。和外国朋友相识，能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似乎就有老朋友的意思了。本以为在西柏林的期间，可以和在北京会过面的德国朋友多一些相处的机会，但是第二天一睁开眼，我便身不由己，被各式各样的记者切成碎块了。

我至今仍感遗憾，给我和诺瓦克、布赫、施奈德、阿诺尔德、库宾相处的时间太少了。

就是在不多的几次相聚中，也因为白天的过度疲劳，或东西方人的习惯，而终于未能畅谈。

如联邦德国著名的评论家阿诺尔德、作家施奈德，以及阿克曼请王蒙和我等人在饭店吃晚饭时，刚刚谈到一些大家有兴趣的问题，如稿费、读者来信（其中有无求爱的人？）、性文学（他们也认为这没什么意思）、作家当官后的

苦恼等等，我却在席间睡着了。这显然败了大家的兴。阿诺尔德见我困得实在可怜，便建议聚会到此结束。我上了回旅馆的汽车，睡得更沉了。直到下了汽车，跟在王蒙后面，走进旅馆大门的时候，似乎还未醒来。我迷迷糊糊地只管跟着他走进一格只能装一个人的旋转门，结果脚被门框狠狠地挤了一下，才把我从瞌睡中彻底挤醒。但是一上床，又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脚背上挤出一块青斑。

还有一次，施奈德、阿诺尔德、布赫等人在施奈德家中，准备了一次盛大的晚餐，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同时还请了西柏林文艺界的不少名人作陪。刚刚吃完水果，中国人却起身告辞了，而有些客人才刚刚来到。他们是特别为了饭后的交谈——这个更有意思的活动。虽然施奈德极力挽留（你知道，西方人的极力，并不具有令人无法摆脱的粘劲儿），大多数人还是走了。事后施奈德以为，这煞费苦心的晚餐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我们解释道，在中国，宴会进行到上水果的时候，就表示到此结束了。

说这些，并无半点抱怨记者的意思。

一个缺陷，也往往带来另一个补偿。

记者们会不会知道，当我成为他们笔下的人物的同时，他们也将成为我笔下的人物呢？

记得在西柏林接待两位从奥地利电台赶来的记者时，曾稍稍地流露过这样的意思。他们有些惶然地问：“你会把我们写得很坏么？”

怎么可能这样呢？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请看吧——

6月12日晚上，联邦德国驻华文化参赞海顿先生，在家里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西柏林之行，举行招待会。

客厅不大，25平方米左右。与会者40余人，后脊背和后腰时不时地会被别人的胳膊肘，或是服务员手上的托盘杵上一家伙。

好象中国女人坐月子，通向阳台的门窗全都关着，冷气也没有开。40余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散发着一一定热量的小火炉。客厅简直成了一个闷罐车，人们不断地出汗，擦汗。

就在这客厅中间，有一块又高又大、蓝白条相间的衬衣的后背，被汗水濡湿了。倒回40年，我准会跳上去，摸着那块背，跳着脚地喊：“噢，背湿喽，背湿喽。”不必解释，那是我小时在关中平原学会的骂人话。

人多，每个人都在说话，便感到听得吃力。于是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致把耳朵塞到说话人的嘴巴底下，也难以听清对方的话。

有人扬声大笑，其声嘹亮如母鸡下蛋后的欢唱。

海顿先生大概站累了，一面和人谈话，一面象运动员投入训练前做准备活动那样，扭动着腰和胯。

我在犄角里，找了张椅子坐下。不一会儿，那位湿后背者，满脸是汗地在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问过了我的姓名之后，他用中文说：“噢，我知道。”

“您贵姓？”我问。

“瓦格纳。”

“好记。”我想到了作曲家瓦格纳。

“不过和那个瓦格纳没有什么关系。”他的脑子很快，一下就跟上了我的想法。

我注意到，他领带上的结子，已不在喉节下老老实实地呆着，而如项链上的坠子，悬挂在胸口。他用食指挑了挑胸前的“坠儿”，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思。”

“你何不取下来呢？”

“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还没看清楚怎么来、怎么去，他脖子上的领带，一瞬间没有了影儿。

“我不喜欢这样的招待会，站着，吃一点儿、吃一点儿，没有什么意思。我喜欢坐着，正正规规地吃。”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的中文不行了，我刚从日本回来，在那里呆了10年，只说日本话。”

“你在日本有何公干？”

“记者。我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

“你喜欢日本，还是喜欢中国呢？”

“我喜欢中国，不喜欢日本。”

有了前面的接触，便知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面前坐了一位中国人。

“为什么？”

“日本人很有礼貌，可是很难和他们交朋友。在中国，可以交到朋友。”

“你在中国有朋友吗？”

“当然。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和我同宿舍的杨，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批评我，”他挥动着粗大的拳头，做了一个出击状，“还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正在找他。”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等你回来，我们谈谈文学好吗？”

在我回答别人一句问话的当儿，他象他的领带那样迅速地消失了。

回国之后，我又见到了瓦格纳，但是他并没有和我谈文学，而是大谈外交公寓的耗子。

“我刚搬来的第一天，房间里除了一部电话，什么家具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正在打电话，房间里的灯也没有开，我看见有一团黑东西，很快地向我窜来。我猛地一跳，让过了它，它钻进墙脚，不见了。”上面的每一句话，他都象演活报剧那样，用动作表演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只老鼠。每天晚上，它在我的书房里啃我的稿子。”他侧过头，用右侧的虎牙，做啃噬状，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可以想见，这是一只对新闻业很感兴趣的耗子。

“有一天我看见它跑进了厕所，立刻把厕所的门锁了起来。我在门外，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又拿了一个闹钟放在门外，让闹钟时时大响；过一段时间，便用力地敲一会儿门。”这些，无一不用一个动作加以说明。“3天之后，它死了。”瓦格纳胜利地大笑。

“不，我想它还是因为喝了我的一瓶香水，它把香水瓶子打碎了。”瓦格纳太太说。

瓦格纳说话时，表情、手势、动作都很丰富，嗓门也大。我觉得他更象个美国人，而不象德国人。

他信口抨击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当然都不是中国的。我不知他如何进行采访，倒好象他时时在接受别人的采访，非常乐意地、滔滔不绝地表示着自己的意见。

瓦格纳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者。

我始终尊敬记者这一职业。

记者的工作和现实生活贴得太近，职业要求他们比作家具有更直接的献身精神，不论他们的肉体，抑或他们的人格。

美联社曼谷9月9日电，美国记者尼尔·戴维斯在泰国政变的激战中被打死。虽然电文进一步解释了戴维斯被打死的原因和过程，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悲壮的事件，美联社却用了“被打死”这样一个口语化的词句。如果使用我们的新闻语言，会说“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中，我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然是已经躺在血泊中拍下的泰国未遂政变中的一些镜头：许多模糊的、摇晃的、却又在狂奔的腿和脚。戴维斯不但给这个动乱的世界，又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实地资料，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

戴维斯用生命换来的那些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的变幻，很快地会失去它的价值。新闻、新闻，新的时

候，方才可闻。时过境迁，变成了老闻，谁还希罕呢？但是戴维斯的职业献身精神，不仅会为他的同行们长久地追忆，也会让一切认真的人，沉思默想上许久。

尼尔·戴维斯让我想起在联邦德国采访过我的北德电视台记者采尔科先生。不过他还好好好地活着，我回国时，他已去他的“别墅”休假。

他的“别墅”来之不易。全部费用来自他的一笔稿费。这笔稿费是他在阿富汗拍摄“重大题材”——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报酬。算他走运，没有遇到尼尔·戴维斯的不幸。

世界总不太平，每天都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里，听到枪炮的轰鸣，看到流血和死人。这些实况谁拍的？还不是各地的记者。这笔钱不好赚呐，是真正的血汗钱。

所谓的“别墅”，建在爱尔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岛上，连采尔科家在内共有两户人家，8口人。逢到涨潮的时候，海水就把他们和陆地隔绝了。“但是保证有土豆吃。”他说，“平时我们就捉鱼、海蟹和龙虾吃。将来如果你有机会访问爱尔兰，一定告诉我，我请你到我的别墅里去写作，绝对地安静。”

以上是采访我时，我对他的反采访。我从不甘心做一个等着挨板子的被采访者。

到西柏林的第二天早上，我还坐在旅馆的餐桌旁，他就来了。瘦高的个子，一副近视眼镜架在同样瘦长的鼻子上。蓝毛衣外面，套着一件灰褐二色交织的西服上衣。

我们驾车沿着 AVOS 高速公路，去万塞湖畔“拍戏”。这条公路在二三十年代，是供车赛用的跑道，现在有一丝被废黜的荒凉。我们的车后，紧跟着一辆面包车，上面装着他的助手和摄像器材。

高大的橡树，巨人般地环抱着万塞湖。壮美的树冠，在风中摇摆出浑厚而低沉的吟唱。德国人常以橡树做为德国民族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身躯，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

湖畔的“沼泽”饭店，是仿巴伐利亚风格的建筑，木顶白墙，窗前、阳台排满了红色的绣球花。房椽的一头，装饰着一个鹿头。一劈两半的木桩子挖空了，架在房前的空地上，里面栽满各色艳丽的花朵，使人有来到阿尔卑斯山区之感。

太阳时隐时现，捉弄着我们的摄影师。他较真儿得厉害，时时地停机，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来。采尔科尽力想要使我不觉得厌烦。

“从前，凡是悬有鹿头的地方，就是猎人们聚会的场所。现在鹿头已经成为纯粹的装饰，还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被欺骗的丈夫们聚会的地方。”

“万塞湖附近发生过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以为他要讲一个神怪的故事给我解闷。“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们在这里召开过一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消灭犹太人。”

橡树林还在云的暗影下安详地摇曳着。它的绿色，也显出难以看透的幽深。我无法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和这个美丽的地方联系起来。

太阳终于出来了。采尔科高兴地说：“我们这里一直下雨，是你带来了太阳。”米歇尔·阿克曼则说：“你是巫婆，把太阳叫来了。”

可是我们仍旧时拍时停。或是因为风太大，橡树不肯安静，从低吟变成激越高昂的喧哗。录音师说，如此这般，我们的对话录音效果就会很差。或是因为摄影师要等湖面上有帆船驶过，使我们谈话的背景，更漂亮一些。难怪他们这样的认真，后来看过这套节目的人对我说，景色和效果都是好极了。因为忙，我自己却错过了播放的时间。

我在风中瑟瑟发抖。采尔科脱下他的西装外套给我穿上。那天我身上的衣服真是穿得不伦不类。长袖衬衣外，是件短袖毛衣。毛衣外是向孔捷生借来的灰绒夹克，夹克外是采尔科的西装，下面是一条蓝布裙。长长短短，一截又一截，还要作湖边观景、林间漫步的风雅状。

在北京上飞机的时候，地面温度是34℃，因此带的全是单薄衣服。西柏林终日风风雨雨，温度经常在16℃左右，冻得我从来没有挺直过腰。

“反正我们不是在拍时装广告。”采尔科安慰我。

我有时并不在乎自己穿什么。只是摄像机镜头使我害怕、拘束、尴尬。如果世界上有最差演员奖，我肯定是头一名。

采尔科一再为耗时之久，以及来回地折腾而抱歉和不安。我说：“别这样不安，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情。你是为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我也有同样的责任，不是么？”

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当夜赶回汉堡制片去了。

后来我进出汉堡时，他或是另有任务外出，或是到爱尔兰附近那个小岛上休假去了。

太阳好象是按钟点租来的，一拍完万塞湖畔的“戏”，它就走了，大雨又开始哗哗地落下。

幸好下午全德第一电视台吕德斯先生的采访，是在室内。

因为只有一台摄像机，它始终对着我拍，等整个采访结束，再补拍采访者吕德斯先生的镜头。他有些紧张，就着镜头上的玻璃，拢了拢头发，照了照面容。

吕德斯先生是学德国文学的。学人文科学的人，在联邦德国很难找到工作。他是在失业两年之后，才找到现在这个位子，我想他一定须做各方面的努力，来保住现在这个工作。

“一般电视记者在采访时，总要做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哪怕他的采访对象是某国的总统。不过我不打算这么做。”在摄影机开动之前，他这样对我说。这大概是西方记者普遍的创作心态，就连《明镜》周刊的大记者也不例外。吕德斯先生作为一个不甚著名、而又必须努力站住脚的记者，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足见他对职业的诚实态度，这令我起敬。

“故作傲慢，恰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说。

摄影师要求我配合他的工作，仍旧坐在吕德斯先生的对面，这可以使吕德斯先生更容易进入角色。

摄像机沙沙地响了起来。吕德斯先生由于过份紧张，严

峻得象要和谁决一死战。我觉得很滑稽，便忍不住笑了起来。在舞台上这叫做“笑场”，有奇异的感染力，最终会导致全舞台演员的大笑。

吕德斯先生果然也笑了起来，我们不得不停拍一会儿，让“笑场”的情绪过去。

工作结束时，吕德斯先生感到迷惑不解地对我说：“你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是那么友好、温和地微笑着，可是你的答话，没有一句是同意我的。”

我愣住了，并不记得自己成心和他捣蛋过。这，算不算他的工作能力差？会不会影响他的饭碗呢？我的情绪不那么好了。

在欧洲，和记者们最后的一次接触，是接受联邦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这次采访，可以说是全部采访的压轴戏。

去汉堡之前，德国朋友就警告我，这家杂志，是联邦德国最大的一家杂志，面向全世界发行，发行量是100万份。唯其大，所以傲慢之极。他们什么人物都见过，就是总统也不放在眼里，偏偏提那些让总统难堪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印象，我来到了《明镜》周刊的办公楼前。我们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就在我迈出汽车的时候，主编玛耶先生正好出现在办公大楼的门前。我猜，他一准在办公大楼的玻璃窗前，看我们那辆普通的汽车，怎样在那些豪华的汽车中间，找一块停泊地来着。

他亲自到大楼门口来接我，真是无可挑剔的客气。但